

LIDEYU YU NIULI DANGZHENG

孙敏 著

LIDEYU YU NIULI DANGZHENG

李德裕

与李党争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李德裕与牛李党争

——《穷愁志》研究

孙 敏 著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吴雨时 郭 齐
责任校对:苟 林 朱兰双
封面设计:冯 洁
责任印制:曹 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德裕与牛李党争 / 孙敏著. — 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04.3

ISBN 7-5614-2779-4

I. 李... II. 孙... III. ①李德裕(787~850) — 人物研究②唐代历史事件 — 研究 IV. ①K827=42②K242.4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7664 号

书名 李德裕与牛李党争

作者 孙 敏 著
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
开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张 9.25
字数 150 千字
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0 001~2 000 册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- ◆ 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。电话:85408408/85401670/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- ◆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- ◆ 网址:www.scupress.com.cn

前言

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我曾对李德裕的《穷愁志》进行过一些研究，当时还打算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将对李德裕及其文学作品做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，并以此作为基础资料提供给对晚唐政治、文学感兴趣的人。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：其一，李德裕作为政治家，在中、晚唐时期具有重要的影响，后人对他的研究也是由此出发。但后人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外部史料进行的，如新、旧唐书和《资治通鉴》等，缺乏李德裕本人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文学作品来进行内证。其二，李德裕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写得非常好，充分展现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。通过他的文学作品，我们可以完整地了解李德裕这个人以及他当时所处的社会。其三，李德裕的文学作品有别于唐代其他文学家的作品，他的文学作品主要作于遭到政治打击和贬谪时期。在李德裕看来，文学作品既不能褒贬善恶，也不能干预时政，它的作用只能是抒发的内心深处的感情。

然而这一想法在后来的几年中竟无法实现。

时过境迁，若干年以后我重新站在古代文学的讲台上，才想起昔日的心愿。于是我重操旧业，查阅资料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终于拼凑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回头看看现在的这一叠书稿，实在于心有愧，因为这与当初的想法毕竟有一定的差距。

李德裕是赵郡赞皇人，由于父亲李吉甫早年在长安做官，他实际出生在长安。赵郡李家属世家大族，在当地有极高的声望，世代做官的人很多，但就李德裕本人而言，祖辈做官的并不多，只有到了父亲李吉甫时才做到宰相的官位。李德裕年轻时自视甚高，不愿走一般读书人走的路。在唐代，读书人进入仕途多由科举，而李德裕对此不屑一顾，这也留给了那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攻击的口实，说他不看《文选》，不喜诗赋，讨厌进士出生的人，以至于后来的牛李党争也以此划分界限。对此后人多有争议。有人说李德裕是没落的世家大族代表，有人说李德裕代表中、晚唐时期的正直力量。后人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因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。

李德裕在后来的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始终沉浮在党争的漩涡中，一生两次拜相，三次出镇浙西，两次遭受贬谪，多次受到排挤，但他始终不渝地为之奋斗。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挽狂澜于即倒，每当他的理想即将

实现时，时局又急转急下，一切希望瞬间化为泡影。此时他心中的郁闷和苦痛可想而知！他太需要宣泄，太需要被人理解，而他的政敌都是些摇唇鼓舌、文采飞扬的高手，他只好拿起笔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怀，于是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。然而他终究不是政敌们的对手，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生后，政敌们铺天盖地的文章最终将他湮灭在文海之中。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《全唐文》中杜牧、李珣颂扬牛僧孺的文章，就再清楚不过了。

在唐代，由进士出生进入仕途的人有极大的势力，他们不仅得到皇帝的青睐，而且也获得社会的认可，他们那流光四溢、令人心旌摇曳的诗歌让广大老百姓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愉悦。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及天下，相互提携，彼此奖掖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那是一个高扬文学的时代，文学也是评陟一切的标准。到了中唐以后，以韩愈为首的一班人发出“文以载道”的呼唤，于是这种泛文学主义的思潮逐渐使一些人产生怀疑：难道文学是判断一切的标准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为何皇上在选拔人才时却只考诗、赋，而不考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策论等？这对于某些人而言，如此不合逻辑的事却在有唐延续了一、二百年，真是不可思议！

于是有人开始上疏反对了。

唐德宗广德元年六月，礼部侍郎杨綰上疏，认为：“古之选士必取得实，近世专尚文辞。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，犹试策而已；至高宗时，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进士加杂文，明经加帖，从此积弊转而成俗。朝之公卿以此待士，家之长老以此训子，其明经则诵贴括以求侥幸。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，如此，欲其返淳朴、崇廉让，何可得也！请令县令察孝廉，取行著乡闾，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。刺史考试，升之于省。任各占一经，朝廷择儒学之士，问经义二十条，对策三道，上第即注官，中第即出身，下第即罢归。又道举亦非理国，望与明经、进士并停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二十二）杨綰是天宝年间进士，连他都认为进士只考诗、赋不合理，并进而偏激地提出罢停明经、进士科。

对杨綰的建议，“上命诸司通议，给事中李栖筠、左丞贾至、京兆尹严武与綰同。至议以为：‘今试学者以贴字为精通，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，风流颓弊，诚当釐改，然自东晋以来，人多侨寓，士居乡土，百无一二；请兼广学校，保桑梓者乡里举荐，在流寓者庠序推焉。’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二十二）最后的方案是折衷解决，即由地方推荐加诗、赋考试相结合。但这一方案并没有实行，否则不会有后来的科举改革。在这次参加通议的人中，杨綰、李栖筠为进士第，贾至为明经第，

严武是荫恩进入仕途，代表的层面还是相当广泛的。由于没有真正实行，所以没有引起什么非议。

七十一年后，即唐文宗大和七年，在李德裕的建议下，试图改革有唐的科举制度，但却引起了很大的非议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大和七年记载：“上患近节文士不通经术，李德裕依杨绾议，进士试论议，不试诗、赋。”

为此，唐文宗下制说：“……汉代用人，皆由儒术，故能风俗深厚，教化兴行。近日苟尚浮华，莫修经艺，先圣之道，堙芜不传。况进士之科，犹要釐革。虽乡举里选，不可复行，然务实抑华，必有良术，既当甚弊，思其改张……其进士举宜先试帖经，并略问大义，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道，文理高者便于及第，其所试赋并停。”（《册府元龟》卷九〇《帝王部·赦宥》）

看来，科举考试改革是必须要进行了。

颇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同样的问题，由于提的人不一样，产生的反响却迥然有别。这期间可能有这样三个原因：一是杨绾是进士出生，由他提出罢停明经、进士，旁人自然不好说长道短；而李德裕不是进士出生，由他来说诗、赋考试是“苟尚浮华”，你凭什么？自然遭到许多读书人的指责。二是杨绾的建议虽经通议，但并未实行。三是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，需经过多年的准备，一旦罢停，前功尽弃，一生前途化乌有。由此引起那些

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强烈不满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

正是基于上述原因，所以当时的读书人才对李德裕颇有腹诽。大中以后，李德裕遭到贬谪，许多文人无所顾忌，便纷纷写文章攻击李德裕。这不得不对后来的人产生影响，如北宋的司马光、南宋的洪迈就是显著的例子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和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明显偏袒牛党。从唐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来看，对李德裕是贬的多，褒的少。

我之所以说明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为什么在一些文献中有那么多攻击李德裕的文章；二是以诗、赋选拔人才的方式究竟好不好？记得有文章说道，唐人以诗、赋的方式选拔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才，而后来以经义、策论的方式却选拔出了一大群无用之辈，以致国道不振，日趋式微，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。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古往今来，每一个统治者在选择人才来治理国家绞尽了脑汁，然而事与愿违，越是用现实的眼光、实用的方法，选出的人往往越不中用。这似乎是一个历史问题，但也是一个现实问题，故而提及。

然而近代以来，情况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，不少学者在其著作中褒李贬牛，如岑仲勉先生的《资治通鉴·

隋唐纪比事质疑》、傅璇琮先生的《李德裕年谱》等，都对李德裕的一生给予积极的肯定。即使是李德裕对牛党的打击报复的行为，往往也是比较淡化。如唐文宗开成二年，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，上任后即上奏牛僧孺在任时钱财账目不清，牛僧孺得知后立即上诉，经复核准确无误，牛僧孺才脱了干系。显然李德裕的上奏是不实的，然而傅著《年谱》对这一材料来源仅表示了质疑而已。

总之，关于牛李党争的争论历来是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基于此，本书在涉及牛李党争时尽量避免主观分析，轻下结论，至于其中的优劣是非，就让读者去评说罢。

本书主要由《李德裕与牛李党争》、《其鸣也哀、其言也善——论李德裕的〈穷愁志〉》、《李德裕诗文选注》三部分组成，最后附了《李德裕简谱》和新、旧唐书《李德裕传》。其中《李德裕简谱》主要是根据傅璇琮先生的《李德裕年谱》删节而成的。

《李德裕与牛李党争》以李德裕为线索，简述了牛李党争的产生、发展和结束过程，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新、旧唐书和《资治通鉴》。对于其间的是是非非，尽量多客观叙述，少主观妄断。由于前人已对牛李党争有较多论述和辨析，所以文中就不再一一赘述。

《其鸣也哀、其言也善——论李德裕的〈穷愁志〉》主要通过《穷愁志》的研究论述李德裕的政治观、历史观和文学观，也就是通过内证的方法来展现李德裕的内心世界，从而展现完整的人物。

《李德裕诗文选注》主要选注了作者的部分诗文，其中赋两篇、诗十四首，对于部分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诗，附有相关的材料，尽可能让读者有一个完整的了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李德裕的文章从未有人注释过，诗歌注释也仅仅是极少数绝句，所以注释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。

总之，本书既没有形成对李德裕及其牛李党争的系统研究，也没有全面展现李德裕一生的精神思想，这是我十分惭愧的地方，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地方。本书在撰写中可能存在不少错误，在此敬请读者原谅。

作者 于泸州长庚宫
2003 年秋

目 录

壹 李德裕与牛李党争/3

贰 其鸣也哀 其言也善
——论李德裕的《穷愁志》/55

叁 李德裕诗文选注/153

肆 李德裕简谱/263

壹

李德裕与牛李党争

壹 李德裕与牛李党争

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，前人和今人多追溯到元和三年皇甫湜、牛僧孺和李宗闵等进行的那一次策试上。如宋人邵博的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九云：“牛僧孺自伊阙尉试贤良方正，深诋时政之失，宰相李吉甫忌之，泣诉于宪宗。”邵博据此认为“牛李之党基于此”。

关于这次制科案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旧唐书·李宗闵传》上的记载较为详尽，《资治通鉴》二三七卷元和三年载：

“夏，四月，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，伊阙尉牛僧孺、陆浑尉皇甫湜、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，无所避；吏部侍郎杨于陵、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，贯之署为上第。上亦嘉之，诏中书优与处分。李吉甫恶其直言，泣诉于上，且言‘翰林学士裴垍、王涯覆策。湜，涯之甥也，涯不先言；垍无所异同。’上不得已，罢垍、涯学士，垍为户部侍郎，涯为都官员外郎，贯之为果州刺史。后数日，贯之再贬巴州刺史，涯贬虢州司马。乙亥，以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，亦坐考策无异同也。僧孺等久之不调，各从辟于藩府。”

唐宪宗征直言极谏之士，牛僧孺、皇甫湜、李宗闵

指责陈述当时政治的过失，言词犀利，无所回避。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时任宰相，时政之失自然责无旁贷，故而泣诉于上，认为是有人指使。

同年五月，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说：

“牛僧孺等直言时事，恩奖登科，而更遭斥逐，并出为关外官（即从辟于藩府）。杨于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，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，皆坐谴谪。卢坦以数举职事黜庶子。此数人皆今之人望，天下视其进退以卜时这否臧者也。一旦无罪悉疏弃之，上下杜口，众心洶洶，陛下亦知之乎？且陛下既下诏征之直言，索之极谏，僧孺等所对如此，纵未能推而行之，又何忍罪而斥之乎！昔德宗初即位，亦征直方极谏之士，策问天旱，穆质对云：‘两汉故事，三公当免；卜式著议，弘羊可烹。’德宗深嘉之，自畿擢为左补阙。今僧孺等所言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，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！”

白居易素以正直、敢于直谏著称，既然连他都站出来指摘此事的处置失当，看来当时的人认为的确有不妥之处。

对于元和三年的制科案，有三点值得注意：一、牛、皇甫、李三人的对策内容究竟针对的是否为李吉甫？二、“泣诉于上”是李吉甫还是另有其人？三、三人对策是否有人指使？

对第一个问题，今传于世的只有《全唐文》卷六八五所载皇甫湜的《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》，而牛僧孺、李宗闵的对策失传。皇甫湜对策中最为激愤的一段文字涉及宦官把持朝政问题，兹录于下。其对策曰：

“盖闻昔之令主，体上圣之姿，御大宁之时，犹惧理之未至也；求贤以致用，犹惧动之不中也。咨谏以闻过，矧唯寡昧，膺受多福，恩负荷之重，警风波之虞，求贤咨谏，岂敢怠忽！至若穷神知化，以盛其德；经武纬文，以大其业。考古会极，通教化之源；明目达聪，周视听之表。斯夙夜之所志，子大夫将何以匡建而致之乎？此陛下之忧勤切至也。

臣闻尧舜以天下为己忧，而未以位为乐也。臣又闻百事之成也，必在敬之；其失也，必在慢之。今陛下念前王之戒，而不敢怠忽；思为国之径，而不忘夙夜。求贤咨谏，延及微贱，臣有以见尧舜之心矣。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，顺阴阳之和以育物，事无不序，动无不时，此穷神知化之盛德也。武以止杀禁暴，则兵宜戢；文以经邦致明，则化必行，此经武纬文之业也。崇礼而明义，好士而尊儒，斥魏晋已降衰末之法，稽周汉以前盛明之礼，斯考古会极之方也。任贤而勿贰，招谏而必行，屏近习之纤佞，进周行之骨鲠，斯明目达聪之道也。抑臣又闻先王所以不视而明，不听而聪，披颈负之